



俞天白  
著

# 沉香女

决定我命运的N个瞬间

# 沉香女

决定我命运的N个瞬间

俞天白  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沉香女:决定我命运的N个瞬间/俞天白著.—上海:  
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208-12947-4

I. ①沉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2287号

责任编辑 楼岚岚

封面设计 储平

沉香女

——决定我命运的N个瞬间

俞天白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227,000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2947-4/I·1369

定价 38.00元

目 录  
CONTENTS

沉香女 ..... 001

后 记 ..... 349

这故事属于我们家庭隐私。

一切变故，始自父亲一场人生命运的大赌大博大弈，父亲彻底地输了。输得一蹶不振，威望扫地。以母亲为首的一家，随时可以肆意地将怨恨、鄙夷、嘲笑、厌恶，污水一般往他头上泼，将一家之主泼成了一个狗奴才。如果当时他想悬梁自尽，家里谁都会帮他选一条结结实实的绳子。起码算是对他不尊重家人的回应。

确实难以想象，这么重要的决定，他居然不回家来和我母亲商量。

父亲没有高学历，却给书本弄得呆头呆脑的，平日里，出了车间，就泡职工图书室，以致被同事们讥消为拿书当饭吃的“书蠹头”。饥谨来了，却为了减少体力消耗，抠下几两粮票，一下班就直线回到职工宿舍蒙头睡大觉。可哪能入眠啊？辘辘饥肠，

使他双眼一合，就做捡到米饭、馒头之类食品或者增加收入的梦。所谓“收入”，当时非常单一，就是指买到食物或者粮票的钱。这次自然灾害实在太猖獗了，为了早日渡过难关，政府放松了管制，默认粮票之类的票证可以“适当调剂，以通有无”，说白了，就是买卖，价格随行就市，自行商定。这种交换方式，开始是隐秘的，地下的，无形的，叫黑市；粮食也有专用名称，叫黑市米。食油、食糖、肉类、鸡蛋、蔬菜、糕点、布匹、棉花、煤球之类，凡凭票证购买的物资，都随粮食放开而放开了，并有了明市与黑市的区别。这种维持民生生存的物资交换，一开闸，立即势如出笼之虎，逼使政府承认了这个计划以外的市场，名之为“自由市场”。传统的、早就有名无实的集市贸易的气象就这样复活了。食品价格自然成倍成倍地上涨，等于工人工资成倍成倍地缩水。能不能增加收入，就是能不能活命的另一种说法。

那个厂休日，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。夕阳西坠，才拖着绵软的双腿，用手掌压着干瘪的肚子，梦游似的离开职工宿舍，来到了堂桥镇。

堂桥镇离厂不远，都在大都市边缘。按城市地图的划分，都归属市区，街道是两排低矮的平房让出来的一条通道，店对着店，铺对着铺，各种字号的铺子里出售的货色虽然五花八门，空气里却飘浮着一股浓郁的农家味儿。

最吸引父亲的，是有蔬菜瓜果的地方。那就是东街口小桥头农贸市场。

熙熙攘攘，嘈嘈杂杂的，他被一男一女的讨价还价声吸

引了。

一个一手抓秤，一手提着一只浦东三黄鸡的农妇在报价：“两斤缺一两。十四块三！”

男人说：“啊？前天我在龙南菜场买的，两斤八两，也十四块！”

农妇说：“龙南是龙南，这儿是这儿；前天是前天，今天是今天。”

男人苦笑着，犹犹豫豫地接过三黄鸡，捏了捏它的腹部，摸摸它的鸡肫，再掂掂分量。

农妇说：“肥着呢，两斤差一两，一钱不缺。不信你到杂货铺核一核！”

男人环顾左右，实在找不出可比的，也找不出可供他选择的食物。心一横说：“那好，我就去核一核！”

父亲看呆了。妻儿从田头地垄、河边埠头带给他的那些顺口溜，什么“城里一个八级工，顶不上农村一捆葱”呀，“嫁军官，怕打仗；嫁干部，怕下放；嫁工人，怕定量；嫁个农民吃得胖”呀，原来都是真的。

一个摆脱困境的主意，便这样占据了他的心，并急于验证。

验证，就是再看看市场行情。这一看，这个主意便变成了决定，而且像钉子钉进了他的脑袋。我的天，青菜萝卜都涨了几倍，一斤土豆就要五块！一个工人的月收入不值十斤土豆呀！他回到厂宿舍，忍不住对同室的师兄弟们说起了这一发现。

他说：“这年月，算啥工人阶级！还不如回家去种地啦！”

这声牢骚，挑开了大伙心里的盘算。七嘴八舌的，一片附和声，有的说，这场灾荒也真怪，前两年乡下苦，眼下却倒过来，苦到城里来了，哪个厂的谁谁谁早就走出这一步啦，不养老母鸡不种土豆，跑跑“单帮”，每个月的收入也要比这点死工资多啦；有的不无遗憾地说，我家祖上就是活在城里的，可惜无路可退呀！

这些牢骚和信息，像腾腾烈焰，把父亲从集市所获的启发熔铸在心里了，尤其是老张头那一句“性命攸关的事，到这步田地，能赌的怎么不赌一把”，把浑身浮肿了的妻儿俩都召到眼前来了。我母亲早就怪他“‘门槛’一点不精！到了这步田地，怎么不赌一把？”嗨嗨，老张头的腔，也是她的腔，老张头的调，也是她的调！

工人蜕变成农民，城镇户口变成农村户口，丢了铁饭碗重端泥饭碗，就发生在这一念之间。第二天一上班，他就下注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送到厂人事科。人事科陶科长倒不觉得意外，只是郑重提醒，事关重大，要想想清楚的哦，然后说了一番劝不像劝、提醒不像提醒的道理，无非大会小会上唠叨得够多的那些套话，“眼下我们碰到的是暂时困难”之类，并特别点明：辞了职，你的户口也要从我们集体户里迁出的哦！这可是城市户口哦！此时此刻，不管户口不户口，集体的还是单身的，城镇的还是农业的，落进我父亲的耳鼓，都像坐在船头听水声。两天以后，便收拾行李铺盖，包括为了节省粮食而备的火油炉子、瓶瓶罐罐，揣着一份户口迁移证和满脑子的宏伟计划，加上让我母亲一个意外



惊喜的期待，毅然跨过了与命运分界线相等的城乡分界线，回到了临水而居的老家。

这老家，指的就是当时编号为第五生产队，原名叫小石桥头村的郊县小村庄。

他从自行车架子上卸下行李铺盖，大汗淋漓地跨进门。

万万没有料到，他的估计百分之二百地错了。我母亲乍一见他的那种意外，那种不可思议，那种惊慌失措，那种无名的恼怒，都别提了，给她火上浇油的，是一个悬挂在他脖子上的大活人——女婴！

这个女婴就是我。

## 2

我是弃儿。

可以想见，凡自行辞职，在汽油也是定量供应的时日，厂里不可能安排汽车相送，更享受不到退休人员那种敲锣打鼓、挂红披绿的待遇。为了活命，竟这样离开默默奉献了整个青春的五洲机械厂去冒险，无奈，遗憾，惶惑，不安，当然也有憧憬，折腾得他通宵没有合上眼，天蒙蒙亮，就起身了，从准备带回家的五只馒头中，取出一只，左拈右拈，才掰了小半块，和了一碗开水咽下，这才蹑手蹑脚地将拾掇好的行李拎到自行车棚里，搁上了二十八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架，离开了厂区。

迎着晨风，刚到厂门不远的公共汽车站，他便听到了我微弱的啼哭声。他好奇地刹住车，左右前后张望。茫茫晨雾，不见人影，哭声却很近。便索性踩下了自行车撑脚，循声寻找。只见候车亭内简易坐椅上有只菜篮子，哭声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。

他信口责怪：“作孽，啥人把孩子丢在这儿了？啊？”

没有人答应。

一辆载重汽车疾驰而过，扬起一股让晨雾更浓的路尘。

我继续啼哭。他俯身一看，被包在蓝布“蜡烛包”里的我，满脸青紫，紧闭双眼，一看便知是刚呱呱坠地的，出奇的瘦小，小得如一只小猫，嘴巴张得差不多占了半个脸面，像啼号，更像待哺，哭声嘶哑，细若游丝，时断时续。他再次大声询问：“啥人把孩子丢在这儿了？”还是没有人应答。他的身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旋转，一张公交车时刻表跳进了眼帘。这是他们职工到市区必乘的公交线路。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苏制的半自动手表，刚五点一刻，离头班车还有一个小时。他的心一紧：“这孩子会死的！”本能驱使他伸出抱我的那双手，刹那间又缩了回去。他想：这一张嘴巴能随便捡的吗？就不说是否有障残了。别惹了！赶紧离开吧！他一转身，我又哭了几声。他的心又是一紧：“这孩子会死的！”他想，为什么不把她送到收容所、孤儿院或者附近的派出所去呢？不管怎样，大小是一条命啊！

他断然转回身子，捧起了我。

就是这一捧，完全驱散了他原本持有的同情与怜悯，让我与这位沈姓的中年人，决定了难解难分、甘苦与共的亲缘关系。

他的右手心触到了小小“蜡烛包”里有一件硬物，就把我重新放回菜篮子，解开来看个究竟，然后决定该怎么做。原来“蜡烛包”内有一个用月牙边白色花手绢打成的小包，紧贴孩子左腹。所包东西还不少。有一只淡黄色带纹路的手串，下压一个小

纸包，是用红色横格信纸包着的一小叠花花绿绿的票证，粮票油票之类，信纸上，工工整整地写着几行用笔娴熟的文字，蓝黑墨水上，有几处给水洇湿过的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文句传达的意思：

生于1961年6月16日凌晨2点15分。女。附赠沉香手串一只和一些票证。恳请收容并如同亲骨肉一般善待她。祝福好心人一家幸福，一生平安，并请接受她生母及其一家的一拜再拜！

他知道沉香很贵重，手绢未展开，一股幽幽的沁人肺腑的异香就荡漾开了，一身漂亮的虎皮纹，更显此物非同寻常。但最让他双眼发亮的，是这许多票证，粮票、油票、糖票、糕点票、布票……他激动得手都发抖了，粮票一斤、两斤、三斤甚至还有半市两的，地方的、全国的都有，还有一年发一次的布票和本季度新发的食油票呢，一大叠哪，毛估估差不多是两口之家半年的定量！他如获至宝，不敢细数，手忙脚乱地重新包好收进了衬衫口袋，用掌心压了两压，然后张皇四顾，生怕露了眼，草草打好蜡烛包，重新抱起我，逃离般地走到自行车旁边，考虑如何妥善地带走我。

他想，抱着我继续骑车吗？不妥，自行车已满载；赶回宿舍，卸下行李，先把孩子送回家吗？卸行李，必须带着我调头回厂去，无异去公开这许多秘密；要么将那些小件行李移到后面车架子上去，把这只“蜡烛包”装回菜篮子里，挂在自行车把手

上？更不妥，架子上已经绑了一只旧皮箱和一只旅行袋，一不小心，摔下来可不是玩的。左右权衡以后，他把手绢包从衬衫口袋取出装进裤袋，脱下衬衣，当成布兜兜，把我悬在了脖子上。小心翼翼地骑着自行车往小石桥头赶。本来两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，却到日高三丈才到家。幸而社员们都没有收工，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。

这一天，我母亲正好身体不适窝在家里。见他这般被扫地出门似的狼狈相，一阵大不祥的直觉攫取了她们，立刻如丧考妣般地呼天抢地起来。她早就怀疑他有“花头”（外遇），想不到已生儿育女，被工厂清除出工人阶级队伍了：“我知道有这一天的！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！我知道你在厂里熬不牢！”

“你想到哪里去啦？啊？回家来和你一起当农民来了！”父亲把我放到竹躺椅上，不慌不忙的，甚至可以说兴致勃勃的，顾不得擦一把额上淋漓的汗水，从左侧裤子口袋里，掏出那只胀鼓鼓的月牙边花手绢包，往她面前递送：“你不是说‘城里一个八级工，顶不上农村一捆葱’吗，你不是一直怪我没有出息吗？好，我听你的，辞职了！孩子是路边捡的！你看看，还有这个！”

“你辞职了？啊？难怪啦！”母亲不接他的茬，跳得越发高了，“我怪你没出息，是怪你没有魄力，门槛不精，瞅空儿赚点外快，可没有叫你不要这只铁饭碗啊！”

不错，母亲确实帮他出过一些主意。饥荒中，国家政策既然放松了，为什么不能像小石桥头村、像堂桥镇上那些敢于冒险的

农民、“门槛贼精”的市民一样，在城乡之间买卖农副产品，获取一点外快呢？对于他，不过是回家过周末时“顺便”做做的事，对这位拥有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男人，肯定要比一般人更有成效。哪叫他辞职呀！

父亲意外得活像从崖岸坠落！一急之间，只能把他的理由一条条列出来开她的窍，不仅描述了堂桥集市上见到的，还引用同事们说出来的，强调他的决定绝对不错。无奈，我母亲就是转不了弯。她是我父亲初中时代的同学，“农业户口”给她精神和物质上的压抑太刻骨铭心了。她把宝押在婚姻上，嫁个工人或者城里人，改变这一命定的格局；经过一番挑肥拣瘦，总算如愿了，她正想借丈夫这块跳板，到五洲机械厂做做临时工之类，一步一步跳出农门。万万想不到，灾荒来了，而更大的“灾荒”，却是丈夫的这一招！尤其教她难以忍受的是如此重大的决定，居然不先回来和她商量商量！谁不知道，自动辞职是不给半分安家费的呀！光凭这几条，她也不能听凭他摇唇鼓舌！她紧紧咬住一句话，寸步不让：“赶紧给我回去，说你不辞职了！说老婆不同意，一家老少都不同意，是你一时糊涂！你要是不马上给我回去，我跟你一刀两断！”

我父亲这才发现自己的荒唐，起码是操之过急了。这一碗回汤豆腐不好吃，白纸黑字的辞职报告是他亲笔所写，在陶科长面前，还说了“孙子才拿这种事当儿戏”的过头话，当时是那样信心百倍、义无反顾，现在看来不回头走一趟，娘子关肯定过不去了。

他浑身冒汗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去，我去！”

母亲说：“马上去，赶紧去！”

“好，就去，就去！”父亲这才想到搁在一边的我，说，“这小囡……”

母亲断然说：“把她带走，顺路送到派出所去！哪能多出这一张嘴巴！”

父亲这才想起一直抓在手里的月牙边花手绢包，它都要给汗水浸湿了，赶忙再次送到她眼皮底下，说：“这是和小囡包在一起的。一起交？”

母亲这才接过来，一展开，双眼突然发了光：“和这个小囡包在一起的？这么多？”

父亲说：“是的。包在一起的。”

母亲顿时没了主意，说：“你赶紧回厂去。小囡的事让我想一想！”

### 3

太阳西坠到钢厂大烟囱淡淡的烟雾里，父亲方才回家。

父亲精神彻底崩溃了。覆水难收。他和陶科长大吵大闹了一场。国家处于空前艰难的岁月，不景气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可以分流，共渡难关，但陶科长不该把那许多吓人的黑帽子往他头上扣，是什么原因逼一个工人出此下策，谁不清楚啊？什么资本主义思想啦，什么不坚定分子啦，吓谁呢？

我母亲遭受的打击远比他沉重。丝毫不顾他的心情，把失望和愤怒，全部变成一声声诅咒、斥责、埋怨，随着唾沫星子兜头扑面地向他洒去。父亲团团转着，重复地吼叫着：“别以为天底下就这么一条路，走着瞧！”像壮自己的胆，又像劝告绝望中的妻子，更像向绝情的陶科长示威。母亲晚餐也顾不上做了，直到幼儿园老师把我的凡哥送到家里来，才想到新的挽救办法，用绝对命令的口吻说：“找荣贵去，托他去对陶科长解释解释，求求



情，我不信打不开这扇门，转不过这个弯！”

父亲问：“有用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死马当作活马医！人家到底是生产大队长！”

父亲吼叫时尽管豪气冲天，但只要有一根救命稻草，也不敢随意放弃。转身就走。

母亲喝住他，问道：“求爷爷告奶奶的，就这样上门？”

父亲呆住了。虽是堂兄弟，但到底五服以外，没有什么特殊感情，何况事关重大。

带什么去？夫妻俩环顾四壁，最后都把目光落在安安静静躺在小床上的我。

当时最有价值的，就是粮油布以及副食品之类的票证。

母亲什么也没有说，从抽斗里取出那只月牙边花手绢包，打开，横挑竖拣，挑出一丈布票，交到父亲手里说：“带去！他家小花的裤子都快露屁股了，像啥？”

可以想见，生产大队长，我母亲眼里的最大权力象征，押下这一宝，一定能够力挽狂澜，及时矫正丈夫的荒唐失误的。

父亲很快回来了，说荣贵愿意去试试。不知是因为随意动用了属于我的这一丈布票，还是出于天生的善良，当夫妻俩都把满腔期望押在荣贵叔身上的时候，母亲说了一句确定了我终身的话：“作孽，刚生下便丢了，作孽呀！既然进了沈家这扇门，不留下又怎么办呢？瞧，单薄得像只小老虫，折腾不起呀！”

感谢我的养母，她和我养父完全可以留下手绢包里的一切，帮一家渡过难关，然后撕毁我那一纸附言，把我送进孤儿收容